

古騰堡的人馬在 19 世紀的中國：深描和隱喻 ——評《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卞冬磊**

書 名：《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作 者：蘇精

出版日期：2014 年 7 月

出 版 社：台大出版中心

本書為 2000 年出版之《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的「續集」（蘇精，2000），恰如作者本人所言：「但願兩書合起來是西方印刷術來華比較完整和清晰的一幅圖像」（本書，頁 xiv；編按：以下另有 27 處引述相同來源，不另註明「本書」）。不過，兩書的命名也透露出差異，從「馬裏遜」一人擴展到「傳教士」群體，作者面對的人事交往與互動關係之複雜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非「深描」所不能及；而「鑄以代刻」及「變局」兩詞，更是一個「隱喻」，表達了作者對技術更替所造成之文化後果的敏感，儘管這個表達，顯得十分含蓄。

投稿日期：104 年 1 月 26 日；通過日期：104 年 3 月 3 日。

* 本文受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訪問項目 2014-2015」資助。

** 卞冬磊為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e-mail: toto1982@126.com。

壹、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的人馬： 傳教士的另一種角色

19 世紀初期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是繼 16 世紀 80 年代羅馬天主教以來，西方宗教組織和近代中國的第二次接觸。作為「上帝的人馬」（蘇精，2006），這群強毅力行的人，自然肩負著拯救靈魂、傳遞福音的重任。可歷史的因緣際會，造成不少角色錯位。新教傳教士的事業伴隨外國軍事力量與國際條約的支持，深深地捲入了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之中，也增加了這個群體面貌的複雜性。

相較發展信徒取得的微弱成果，印刷、出版、教育等文字事業，涉及觀念之更新，最受研究者重視。因此，傳教士的中文作品、科學知識、觀念引介、翻譯活動等，已產生汗牛充棟的成果。本書研究範疇亦屬文字事業，但未曾拘泥於此。作者將「文本」擴展到「圖書文化」層面，從而涵納了「撰寫著述、生產複製、傳播流通、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等連串互動的環節」（頁 1），此種認識頗類似於書籍史專家 Darnton（1990／蕭知緯譯，2011，頁 88）提出之圖書的「傳播線路系統」（communication circuit）——「從作者到出版人，再到印刷的人，再到運輸的人，再到賣書的人，最後到讀者」。儘管本書重點描繪「西方鑄造活字取代中文木刻」這一圖書生產複製的過程，但由於早期來華傳教士人手短缺，常常集作者、印刷、分發於一身，因此，本書覆蓋了圖書之傳播線路系統的大部分路徑。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特別重視印刷出版，箇中原因除口頭傳教受阻外，其深層在於他們自身就是古騰堡時代的產物。如作者所言，「他們既無法進入中國，即使利用木刻印刷也受制於掌握技術與價錢的中國

人，尤其傳教士成長於印刷文化之中，視印刷品為日常生活環境中理所當然之事」（頁 256）。因此，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他們成功地運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生產中文知識，並最終引起中文印刷出版的變局。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是「古騰堡的人馬」。

貳、綿密的「深描」：「鑄以代刻」的發生

本書論及的內容，恰可按照傳教組織的歸屬國一分为二：前七章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後八章為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 19 世紀初到 70 年代之間，這兩個國度的傳教士群體，在中華帝國的不同空間裡，平行地進行著中文知識的生產和印刷技術的革新，共同促進了「鑄以代刻」的發生。

一、英國倫敦會的作為：邊陲、上海及香港

一至三章描繪倫敦會傳教士在中華帝國的文化邊陲所進行的知識生產。其中，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作為來華第一人，其對中文印刷技術的貢獻主要在於觀念的宣導，對後來西式活字的使用有積極的促進作用。1814 年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首先使用活字印刷中文。1823 年，麥都思（Walter Medhurst）在巴達維亞建立的印刷所，也偶爾使用中文活字，但由於活字短缺，須經常「修改書稿內容的用字遣詞，以遷就手頭現有的活字」（頁 106），顯示了西式中文活字運用初期的獨特面貌。

五、六兩章的地理空間落在上海。1843 年到 1847 年之間，墨海書館即已顯示出注重活字印書的趨向——「最常使用的印刷方式，是鑄造

的和雕刻的兩種活字混合排印；其次是木刻，而石印和鑄版都僅僅偶一為之」（頁 182）。1847 年以後，墨海書館進入了「機器生產的時代」（頁 210）。

第七章描繪香港佈道站的英華書院。作為第一家鑄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華書院積極鑄造中文活字、並對原料、字形、印刷機、油墨等技術進行了改進。1873 年，英華書院被「中華印務總局」購入，本書認為這項交易具有歷史性意義，「象徵著傳教士引介西式活字印刷來華行動的結束，從此展開的主要由中國人自行使用和推廣的本土化階段」（頁 305）。

二、美國長老會的作為：澳門、寧波與上海

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稍晚來華。第九章著墨於 1844 年建立、存續時間僅一年的澳門華英校書房，其產品雖只有 5 種，但卻「都是巴黎拼合活字生產的初期作品，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頁 339）。澳門華英校書房因而是「中國第一家以西式印刷術生產中文產品的印刷所」（頁 346）。

第十章即追溯寧波華花聖經書房的歷史，其顯而易見的特點是擁有現代化的機器和活字以及石印機、新式鑄字機、立式壓紙機等；尤引人矚目的是，它發展了中文活字的數量和種類，成為當時「擁有最多也最先進西方印刷機具的中文印刷出版機構」，也是「唯一擁有這四種活字的印刷所」（頁 387）。

本書最後兩章闡述上海美華書館的作為。除以九台華盛頓手動印刷機進行工作之外，負責人薑別利（William Gamble）用電鍍法複製活字獲得成功，大大降低了鑄造中文活字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進一步擴展了

中文活字的顧客群，除上海道台丁日昌外，還「包含在上海本地新開活字印刷所的中國人，以及在蘇州地方開辦活字印刷所的官府」（頁 563）。此外，美華書館還培育了從印刷、裝訂到鑄字各部門的中國工匠，中文印刷事業「鑄以代刻」的時代已然來臨。

參、儉省的「隱喻」：對中文印刷「變局」的追尋

人類社會的資訊方式已經歷多次變遷，從文字、手抄本、印刷術到電子媒介。每一次知識生產和呈現方式的轉折，都會導致相應的文化後果。譬如，Ong（2002／何道寬譯，2008）揭示的口語文化和書面文化的巨大差異；Eisenstein（1979／何道寬譯，2010，頁 20）發現的「蘊藏在手抄本和印刷機之間的變革力量」。而當下對電子媒介取代印刷文本而造成的擔憂，正在被濃墨重彩地書寫著。

訴諸中國歷史，「手抄本文化的流動性本質」（田曉菲，2007，頁 6）、「印本在中國的崛起」（McDermott, 2006／何朝暉譯，2009，頁 39-73）、「晚明出版業的繁榮和讀者大眾的誕生」（Ko, 1994／李志生譯，2005，頁 37）等議題，並不鮮見。不過，人們還很少注意印刷內部的變遷及其後果，對「鑄以代刻」這一現象的論述就十分薄弱。儘管，書籍史專家 Chartier（1994／吳泓鈔、張璐譯，2013，頁 18）提醒，「衡量東方文明的印刷文化，不能僅以西方技術為尺。雕版印刷自有其優勢」；和古騰堡的活字一樣，雕版印刷術同樣可以造成「大規模的印刷文化」。不過，他同時又說，「每一種形式，每一種載體，每一種收發文字的結構都會深深影響其用法和闡釋」（頁 25），此語暗含知識生產方式差異可能造成的不同文化後果。

本書是一本以一手史料為基礎、以還原史實為最高目的的傳統歷史

學著作，未能向《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一書那樣大量觸碰理論，並展開論戰——「不能僅僅把印刷術當作複雜因果關係的許多要素之一，因為傳播變革使因果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Eisenstein, 1979／何道寬譯，2010，頁 437）。然而，本書既以「鑄以代刻」命名，也體現了作者和寫作《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一書時不盡相同的心境。本書字裡行間，尚能捕捉到一些零散搖曳的思想火花，指引讀者去追尋中文世界「鑄以代刻」的發生，造成了中文知識世界何種可能的後果。

首先，本書常有提及，相較木刻印刷，西式活字印刷可能比較適合出版即時的、變化的、世俗的知識。如「導言」部分論及，西式印刷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可分為討論與嘗試、準備與奠基、發展與本土化時期，其中，「從同光之際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國內外情勢的變化日亟，知識份子渴望獲得即時訊息並表達意見，但傳統木刻無法滿足新式媒體大量而快速生產的需求，這讓西式中文活字獲得加速發展的機會」（頁 3）；同時，作者亦曾引用馬禮遜的書信，談及「中文木刻印刷很不適合用於傳播即時而日常的出版品（new and daily literature）」（頁 25）。

其次，本書偶有西式活字印刷更加適合知識「廣傳」需要的表達。譬如，中國傳統木刻印刷的特性是「一版多刷、每刷少量」，而西式活字印刷通常是「一版一刷，一刷多量」（頁 438），兩者會造成不同的圖書供求形態，即「活字積極講究市場行銷技巧，不斷尋求潛在的市場，長期下來便促成歐洲及海外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而「木刻導致出版業比較缺乏擴展市場的需要和動力」（頁 5）。此外，作者還曾直接議論，「篇幅較大的書全部以活字生產，這個現象說明傳統的中文木刻再也不能應付承擔『廣傳』角色的墨海書館快速大量生產的需求」（頁 198）。

這些散落的文字，不禁引人思考印刷技術對傳統中國的書籍出版和中文知識形態的影響。明清以來，中文書籍出版市場的「核心書籍」是四書五經之類的教材、實用性的使用說明手冊和通俗讀物（包筠雅，2008，頁 67），其中，又以儒學教材最為暢銷。儘管史家對晚明以來圖書市場的繁榮有不少描述，但無論與近代化的西方橫向比較，還是與「鑄以代刻」發生後的中國縱向比較，木刻雕版印刷時代的知識更新十分緩慢。

媒介社會學家 Neil Postman 說，媒介是一種隱喻，它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最終能控制住文化——「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Postman, 1994／章豔、吳燕廷譯，2009，頁 10-11）；「印刷機不僅是一種機器，更是話語的一種結構，它排除或選擇某些類型的內容，然後不可避免地選擇某一類型的受眾」（頁 40）。與慣常的認識不同，這是一種反向視角，重視技術對文化和知識的規範。正如石印技術特別適用於「印刷古籍、書畫」（韓琦，2008，頁 126），木刻雕板這種印刷方式，「更傾向於重印舊書而不是出版新書」（McDermott, 2006／何朝暉譯，2009，頁 43），它所偏好的恰恰是儒學典籍這種相對固化、長期不變的知識，從而定義了傳統中國的現實和思想世界；而由金屬活字、油墨和印刷機構成的印刷方式，則本身就偏愛流動的、變化的知識，因而可以扮演早期近代歐洲文化變革動因（an agent）的角色。在這一層意義上，「鑄以代刻」的隱喻，或可以表達為近代中國的知識從經典走向世俗、從永恆走向流動的「變局」。

肆、歷史學家的技藝：史料的挖掘與使用

本書作者有一段非常感性的獨白，描述了 1994 年赴英讀書的心

境：「三年期間，無日不為自己年近半百竟前途茫然而惶恐，又深覺既已入傳教士史料寶山豈能空返，於是為了忘憂解愁，也為償多年宿願，埋首拼命抄錄傳教師的書信手稿，成為一個落寞的過河卒子在異鄉苦讀中唯一的遣懷之舉」（頁 xiii-xiv），讀來令人心生敬意。

本書挖掘的史料、編織的故事，有別於一般研究傳教士的歷史著作。不僅因為作者抄錄傳教士手稿檔案異常艱辛，還在於本書不但注重文本，還特別關注了知識生產的後院（「經費與管理」、「工匠與技術」）、台前（「產品與作者」）和遠方（「流通與影響」）。綜而觀之，本書除重現「鑄以代刻」的歷史外，還有以下三大貢獻：

首先，修正或重建了較多史實，使西方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進一步清晰。譬如，對「澄清了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的許多錯誤」（頁 122）、重現了偉列亞力在墨海書館的工作情形（頁 201）、確認了《遐邇貫珍》的創刊主編（頁 277）、揭示了寧波華花書房遷移上海的真正原因。類似例證，俯拾皆是，避免了真相隨時間日久而淹沒，對傳教士研究有極大貢獻。

其次，部分華人印刷工匠的輪廓得以浮出水面，豐富了中國印刷出版史的書寫。本書人物繁多，除傳教士之外，還有許多參與西式中文印刷的中國工匠。他們本是歷史舞臺上的無名小輩，不過，透過傳教士的眼睛，「多少還可以見到這些工匠的身影蹤跡」（頁 494）。本書還原了部分工匠的手藝、性格與日常生活。僅以美華書館為例：蔣先生，一名「非常優秀的領班」（頁 494）；鮑哲才，「最好的排版工」（頁 495）；王鳳甲，刻字「字形之美無與倫比」（頁 498），這些描繪「散落於文字之中，彌足珍貴」。

第三，追尋了文本、活字在中國社會的流通與接受，為後續研究提供了線索。近年來，書籍史研究十分重視文本的接受，試圖解決作品到

達讀者之後引起的反響。本書各章常常安排「華人反應」之內容，雖是從傳教士的視角看待，仍有「一面之詞」的遺憾，但這些敘述提示了展開閱讀史研究的可能。譬如，麥都思多次報導「華人喜愛閱讀《特選撮要每月紀傳》」，「還有人養成每月準時期待《特選撮要》出版以便閱讀的習慣」（頁 110）；「至少兩名秀才、一名有官銜的人和兩名『可敬的人』（respectable man）」前來討論教義（頁 196）；一些官員對西式印刷成品表示「高度的滿意」、一批當地的下級官員和文人對「活字的美觀與清晰大為贊許」等（頁 347）。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伍、結語

朱維錚（2011，頁 328）曾說：「鑒於由西方傳教士作為主要媒介的那三百年的交流情形的複雜，雙方遺存的官私文獻又極其矛盾，因而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基本的歷史事實，顯然是排除任何成見或模式，如實考察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關係的初步。」今天的歷史學，理論與敘事深深糾纏，似乎每一部歷史學作品都逃不過追問。模式固然重要，理論也是急需。然而，從錯綜複雜的、艱難獲取的史料中理出一個又一個基本的史實，仍是歷史學家最重要的事功。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本書未涉理論，但所採史料均為一手，且運用嫺熟，敘事細密，翔實可靠地呈現了 19 世紀初到 70 年代期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引介西方活字革新中文印刷的歷史過程，是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力作。

參考文獻

包筠雅（2008）。〈17-19 世紀中國南部鄉村的書籍市場及文本的流傳〉，《清史

- 譯叢第七輯》，頁 40-7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田曉菲（2007）。《塵幾錄》，北京：中華書局。
- 朱維錚（2011）。《音調未定的傳統》，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何朝暉譯（2009）。《書籍的社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McDermott, J. [200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何道寬譯（2008）。《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原書 Ong, W. [200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何道寬譯（2010）。《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Eisenstein, E.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吳泓鈔、張璐譯（2013）。《書籍的秩序》，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Chartier, R. [1994].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李志生譯（2005）。《閨塾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Ko, D.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章豔、吳燕廷譯（2009）。《娛樂至死 童年的消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Postman, N. [1994].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Redefining the value of school*.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蕭知緯譯（2011）。《拉莫拉特之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Darnton, R. [1990].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韓琦（2008）。〈晚清西方印刷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韓琦、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和書籍史》，頁 114-127。北京：商務印書館。
- 蘇精（2000）。《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學生書局。
- 蘇精（2006）。《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